

星期天夜光杯

95岁徐永辉 人民是我镜头的主角

◆ 韦泱



徐永辉近影 徐汇报

夜光杯朋友圈



扫码看视频

在杭州,握着九五高龄的摄影家徐永辉老先生的手,觉得蛮有力道,真是举了一辈子相机的手啊!我说来看看您。他用上海话回答我:“告诉侬,我是上海人哎,从小在徐家汇长大,儿子的名字就叫徐汇。”听此令我兴奋,真是他乡遇到“老上海”了。去年,老人荣获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(摄影)。子承父业,也是做摄影记者的徐汇,站在一旁,听着笑着。

我是上海人,在杭州工作的老人,
我非常喜欢看《新民晚报》
叶瑾徐永辉

徐永辉寄语家乡读者

在万籁鸣门下学徒

1 一九三〇年,徐永辉出生在徐家汇的一户贫困农家。那时,这片地区不是农田就是河浜。兵荒马乱的年月,母亲深知营生艰难,希望儿子学点手艺,就把十四岁的小永辉,送进市内福煦路(今延安中路)的“万氏照相馆”,这馆是与“王开”“中国”齐名的三大馆之一,由动画大师万籁鸣先生主持。徐永辉从定影药水的配方、照片如何洗放等,一步步学起,在墨黑的暗房里,一干就是三年,有时一天印放的照片达千多张。由于显影药水有化学性,他的双手常被腐蚀得脱皮、肿胀,但他一声不吭。这就是三年的学徒生活啊。有五名上海学徒工跟着万籁鸣学艺,徐永辉是岁数最小的一个。他虽然年岁小,但钻研的劲头一点不小。几个师兄待永辉都不错,当自家弟弟一样关心他。其中三个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哪!他们常在一起,把暗室当秘密活动点,也不避讳永辉。因此,他常听他们讲许多他那时还不明白的事情,但有一句话他印在了脑中:“到解放区去,那里是有饭吃、有衣穿,还可读书学文化的地方”。此后,解放区,成了徐永辉向往的圣地。

不久,三位师兄都先后去了解放区,其中有一位叫陆文骏,临走悄悄对永辉说:“等着吧,我不会忘记你的。”在照相馆里,万籁鸣很喜欢永辉这个小徒弟,常常手把手教他摄影技术。学徒期一满,徐永辉就开始摆弄照相机,不到一年时间,就掌握了人物拍摄的基本要领,可独当一面从事摄影工作了。不久,徐永辉学成出师,按老法规矩,可以闯天下了。他先去了另一家照相馆,又去了交通大学附属夜校进修,但心里仍想着师兄的话,想着解放区。一九四九年五月,上海解放了。第一次听到进城的解放军唱着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,徐永辉心头亲切无比。六月中旬,家里突然进来一个“不速之客”,他一看却乐开了花:“是你啊,陆文骏。”原来这位师兄到解放区后,又随军南下到了杭州,这次因公到上海,特地来看望小师弟的。回杭后,陆文骏很快给永辉写来一封信,请他速去杭州南山路,到部队政治部摄影组去找师兄。

真是万氏门下的师兄弟,情谊深厚。书信中都不忘恩师的栽培,不忘上海暗室里相处的岁月,因为给他们这一切打下扎实的基础的,就是万籁鸣先生传授的摄影技术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徐永辉特地从杭州到上海,去因拍摄《大闹天宫》等动画片而誉满艺坛的万籁鸣老师家,当面向恩师表达感激之情。忆起当年授艺学徒的“学生意”往事,两代摄影人有说不完的话,真正是“名师出高徒”啊。

2

离沪赴杭人生翻新

一九四九年七月,徐永辉从上海到了杭州,在师兄陆文骏的推荐下,考进杭州新闻干部学校,开始了新闻专业的学习。这所学校,就是为刚创办的《浙江日报》及省、县两级政府输送新闻人才的,社长陈冰兼学校校长。半年后徐永辉毕业,到报社实习三个月后,分配去武康县担任通讯干事。第一篇关于农作物病虫害的采访稿在上海《解放日报》刊出,虽只有豆腐块几十字,却让他高兴了好几天。忽然有一天,报社来电话,催他立即赶回去报到。原来社里紧缺摄影记者,陈冰社长想起曾有一个在上海“万氏照相馆”工作过的学员,就让秘书找来了徐永辉。赶到报社,陈社长亲自找徐永辉谈话,了解他在基层的工作情况后深表满意,并郑重地将一台德式“蔡司”相机交到他的手上,叮嘱说:“这是谭震林政委(时任浙江省委书记)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,给我工作之用,现在你用它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。”就这样,一台相机,改变了徐永辉一生的命运。

一九五〇年春,才二十岁的徐永辉,作为报社的摄影记者,第一次单独外出采访,到杭嘉湖地区报道农村题材。他想到,一年前他从上海到杭州,准备参加革命工作,心情是何等激动,可途经嘉兴七星乡桥畔,突遭国民党飞机轰炸,列车受损严重,只得停驶,半夜修复后才开到杭州。空袭使当地不少农房毁坏,庄稼田里坑洼一片。这惨不忍睹的一幕,一直印在他脑海里。他想,如今那里情况怎样了?他决定先去看看。一早就到了七星乡,刚进村口,就传来儿童歌声,唱的是他熟悉的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,循声找去,他到了一户农家,父母与三个小孩,虽然他们的家境还不是太好,衣服上打着补丁,但主人的精神面貌却是开朗舒展。在征得同意后,徐永辉举起“蔡司”相机,拍下了他的第一张农民照,刚刚进入新社会的叶根土一家五口的“全家福”。同时,也开启了他人生的崭新篇章。



上世纪90年代,徐永辉看望恩师万籁鸣

3

跟踪摄影七十年

自从为叶根土全家摄影后,徐永辉就一直把这张照片收藏在采访本里,想有时间再去他们家看看。四年后,他在采访途中又拐进了七星乡,特地去村里叶根土家,一看却是人走屋空,十分失望。邻居说:“已经两年多了,不知这户人家搬到哪里去了。”之后,他不甘心,连续四次去这个村找叶根土,都是无功而返。但他并不气馁,第五次上七星乡时,遇到一老农告诉他,叶家不是本村人,这几年他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,就搬回浙东黄岩老家了。徐永辉默默记下这个地方。一九五九年,徐永辉正好有台州的采访任务,就带着叶根土全家合影照,赶去了黄岩县,来到一个叫凉棚岭的村庄,东寻西问,终于找到了叶根土,两人相见喜极而泣。听叶根土说,自从那次拍照后,七星乡给他们家分了田地和房子,日子越过越好。然而他们想家心切,在两旁的乡政府帮助下,终于回到了老家。夫妻俩参加了合作社,大女儿也在社里干活挣工分了,大儿子读小学五年级,是少先队员。如此的农家变化,让徐永辉欣喜不已,说来吧,我再给你们拍一张真正过上幸福生活的“全家福”。

照片拍好带回报社,他配上文字送审。时任社长兼总编的于冠西,立刻被照片朴实的画面吸引住了,挥笔为这组报道写上“一户人家十年间”的标题,并加了前言,配了一首长诗后,签发付印。一整版专题报道,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,千百封来信涌往报社,纷纷赞扬《一户人家十年间》生动感人,虽然照片拍的是贫苦农民叶根土一家的变化,却是中国数亿农民翻身上幸福生活的缩影。在一次摄影工作会议上,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的石少华说:“徐永辉的跟踪摄影报道《一户人家十年间》,具有独特的新闻摄影创新风格。”

从此,徐永辉与叶根土结下了深厚友情,前后七十年持续不断采访拍摄,在新闻界开启了“跟踪报道”的先河,并有了“跟踪摄影第一人”的称誉。对一户农家,先后采访五十多次,通信一百三十多封,拍照千余幅,这在中国摄影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。从此,徐永辉找到了自己的采访“焦点”,那就是多到农村去,寻找与自己同命运的农民兄弟,与他们交朋友,为他们拍摄更多的照片。叶根土之后,贺金才、李招娣、汪阿金等数十个农民形象,以及一户户家庭,都被他捕捉到镜头中,“跟踪摄影”报道成了报社图文并茂的名牌栏目。这些具有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的作品,见证了我国农民从贫困到走上富裕道路的历程。十年、二十年到七十年,第一代、第二代到第四代,拍摄对象从结婚、生子、入学、入党、参军、盖房、买车,一家人的变化,展现了国家的复兴之路。

由于常跑农村,徐永辉练出了体力和速度。有个小插曲,一九五七年春,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访问浙江,报社派他前往拍摄采访。当他快速赶到杭州中国剧场内,正好见到走进大厅的周总理,总理笑着指着他说:“你的两只脚比汽车轮子还快啊,希望你成为一个出色的好记者。”他赶紧说:“谢谢总理。”当天有48位中外记者到场,而他是第一个赶往剧场采访的中国记者,发出了独家图片新闻《周总理与民同乐》。从这年起,徐永辉的农村题材作品《新式秧田》《农艺试验场》入选国际影展,在荷兰、波兰、匈牙利、苏联等国巡展,他也成为了新中国最早参与出国展览的六位摄影家之一。

那时农村的交通状况并不完善,外出采访主要靠自行车和两条腿,徒步一整天、两整天都是家常便饭,肩上还要背沉甸甸的整套摄影器材,外加一床棉被,运气好时可以寄宿农民家里,或乡里的简易招待所,他觉得只要能过夜就行。为了采访“扫盲女状元”李招娣,他翻过两座大山,终于找到那个大山包围中的无名小村,在山路崎岖、羊肠小道上来回走了六整天。为了拍好一个人物,他不顾自己的安危,一次在天目山区,他想有个制高点,却从树上重重地摔了下来。而每次遇险,他都轻描淡写地说“没啥没啥”。

为了摄影事业,徐永辉几十年与妻子沈秀铭分居沪杭两地,上海家里的事妻子全揽下了。报社关心他,曾多次想解决这个问题,把他调往上海的新闻单位,都被他婉言谢绝。他说:“我离不开这里的农民,他们是我拍摄对象,要长期跟踪下去。”即使退休后,他仍喜欢住在杭州,说生活习惯了,还有两户农家后代要跟踪拍摄,同事朋友见面也方便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徐永辉七十多年心系农民,他的努力,换来了诸多荣誉。一本本扎根泥土的相册,成千上万个镜头,七十年光影无声,七十年人间巨变。他说:“我一辈子就是时代变迁的记录者。”

徐永辉的成就,也是上海人的一种荣光啊!